

徘徊于理论与现实之间

——20世纪20年代中国旅苏游记中的苏联形象

陈晓兰

(上海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6)

内容摘要: 跨文化的旅行活动和写作不仅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而且是促进本土文化和社会变迁的潜在推动力。近代以来的旅苏游记塑造的苏联形象, 成为中国人认识苏联实体的重要媒介, 同时也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对于苏联的不同评价和情感态度。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的苏联并非是瞿秋白一人的独白, 而是处在众声喧哗中, 是一个理论上令人向往实际上却魅影憧憧的形象, 它蕴含着当时中国人民对于俄罗斯传统、苏联革命及现实的种种矛盾态度和评价。

关键词: 跨文化旅行; 旅苏游记; 苏联形象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08)03-0065-06

如同欧洲的跨文化旅行及写作在其国家的殖民扩张中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近代以来大规模的海外旅行活动及写作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者都为自己国家的人民和领导者提供了本土以外的世界的知识, 成为本土国家的人民认识、体验异国实体的重要媒介。作为跨文化旅行书写的典型文体——旅外游记, 记录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两种人之间进行的跨文化接触和遭遇。萨义德(Edward Said)在对于西方的东方形象的研究中发现:“东方‘形象’之所以是形象, 是因为它们表述或代表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实体,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形象人们才有可能把握或看到这一实体。”^[1]近代以来, 中国的俄、苏形象不断发生变化, 从近代出使日记中的军事强国、到20世纪20年代的恐惧世界, 再到30~50年代的乌托邦天堂, 以及90年代混乱无序的危险所在, 不仅折射出苏联的变迁, 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这种变化的反应。

中国游记俄罗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康熙时代的图理琛, 他的《异域录》(1715)被看作是中国第一部旅俄游记。19世纪后期出使大臣的使俄考察和日记, 如张德彝的《随使英俄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曾纪泽的《使西日记》等等对俄罗斯的地理位置、领土管辖、关口要塞、军事政治制度, 与俄的外

交事务等都做了详细的记述。但这些游记的目标读者是清廷而非大众。俄罗斯之大规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20世纪。1917年3月3日俄国二月革命爆发, 同年4月开始, 中国报刊对俄国的时局、“俄国社会主义”、“极端主义者”、“极左党”、临时政府、俄国与德国关系, 以及列宁的动向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对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 中国的认识和评价众说纷纭, 或者将其视为“党派分歧, 政令不一, 职工、兵卒飞扬跋扈”、陷于混乱无政府状态的国度, 令人愕然、困惑、悲哀、恐惧; 或者将其视为改变中国经济落后、政治腐败、铲除压迫社会之一切黑暗势力的出路。在此苏联成为中国关注焦点的背景下,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游历、考察苏联、书写苏联的热潮。1920年秋, 瞿秋白、李仲武、俞颂华一行三人以《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 前往苏俄考察, 拉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考察苏联、书写苏联的序幕。瞿秋白的《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1920~1921)、《赤都心史》(1921)和俞颂华的《游俄实纪》^①、李仲武的《游俄国见闻实录》, 最初均发表在颇具影响力的《晨报副刊》, 单行本连续几年不断再版。20年代与瞿秋白等三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考察游历苏联并创作了游记的无政府主义者抱朴, 于1921~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再次赴苏, 著有《赤俄游记》(于1926年2月由北新书局出版时附有日本人增田正雄的《赤俄印象记》, 1927年5月再版)。1925年

收稿日期: 2008-01-22.

作者简介: 陈晓兰(1963—), 女, 甘肃张掖人, 博士, 副教授, 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①他的《俄国旅程琐记》以濬庐的笔名收在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国外游记汇刊》中, 其中还收有天我的《旅俄通信》, 溻声的《俄游杂忆》。

徐志摩以个人身份、作为一个“平淡无奇的游客”去苏联旅游、考察,写了《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刊载于《晨报》副刊,但这部游记远没有《再别康桥》、《巴黎的鳞爪》和《翡冷翠的夜》那样广为流传。1926年,胡适赴英时途径莫斯科,参观了革命博物馆、莫斯科监狱并考察了苏俄教育的情况,并将自己的游历观感写在了给友人的信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各国及日本的观察家和作家也写了大量的苏联游记,其中部分游记或者连载于中国报刊,或者被翻译进中国。早在1920年《晨报》就分90多期连载日本人的苏联考察记,《新青年》第8卷第3期发表了沈雁冰译的《游俄感想》,化名为高登·莫里斯自称是俄国流亡者的《赤俄游记》(又名《地狱的天堂》),1928年由民智书局出版。还有部分没有译介的游记,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传播。譬如在徐志摩去苏联考察之前,他就已经阅读了他所崇拜的罗素和H. G. 韦尔斯的旅苏游记。胡愈之在去苏联之前也曾经阅读过日本戏剧家、世界语者秋田雨雀(1883~1962,于1927年访问苏联)著的《新俄游记》(又名《青年苏维埃俄罗斯》,明月书局,1930)。他在这本书里说:“知道苏俄的将来的,便知道了全人类的将来。”^[2]然而,有关现代旅苏游记的研究如同苏联问题的研究一样,一直受到许多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大量游记作品被尘封于历史文献的旧纸堆中,被排除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

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处境艰难,战争、内乱使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严重短缺、城市饥荒蔓延。苏联领导人面临着如何解决困境和建设国家的问题。动用军队、采用严厉手段征集粮食,囤积余粮者判处徒刑;企业国有化,在国家统一计划和集中管理下开展生产,废除一切私有财产和私人商业;分配制度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将一切物资集中于国家手中,统一分配。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理由,其利弊也已为历史所检验。史学界对此也有了明确的判断:“战时共产主义”“体现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的盲目乐观和向共产主义的直接进军。这造成了国家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带来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沉重危机。”^[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关心苏联、向往苏联的知识分子奔赴苏联进行实地考察,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中,人的问题和文化状况,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他们作为外来者、局外人、旅居者,更多地从实际的生活和耳闻目睹的现

象,体验到的是经济、政治政策实行的方式和实际的结果,艰难困苦的现实景象使一些人徘徊于理论、信仰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深感迷惘,另一些人则对社会主义理想产生了极度的怀疑甚至否定。

瞿秋白、李仲武、俞颂华一行三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苏俄考察,拉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考察苏联、书写苏联的序幕。瞿秋白写下了《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和大量的政论性文章。可以说,在赴苏考察以及有关苏联的写作中,瞿秋白既是作为一个体的书生、文人,又是作为一个职业记者、社会活动家的双重身份观察、体验和书写苏联的。浪漫的幻想、个性体验,自己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的苏联现实与现存的理论体系、政治信仰之间,与通过参加仪式、集会、采访、参观、访问、政治外交式的交往所获得的有关苏联的知识之间存在着裂缝和矛盾。

在赴苏之前,尽管社会上充斥着各种有关苏俄革命和现状的不利传言,但是瞿秋白不论从理论和情感上都对苏维埃革命持赞同态度。他在个人及家庭的生活处境中养成的平民意识、平均思想,对现实中国社会的悲观认识及个人的愤懑,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的有限接触,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对“托尔斯泰主义”的赞同,使他对十月革命以及革命初期的“平均主义”、废除财产私有等等都表示赞同。他视这世界上第一个“劳农的”国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世界革命的中心”,是“灯塔”,是光明的所在,是“自由门”,是透进黑暗中国的一线光明。在对异域苏联和本土中国的想象中,瞿秋白表现出法国学者巴柔(D. H. Pageaux)所说的那种“狂热”态度,他把尚未谋面的苏联看成优于现实中国的存在,与此相对应的是对当时本土中国政治及社会现实的否定和贬抑。正如巴柔所说:“由于‘狂热’态度,对异国的描述更多属于‘幻象’。这种乌托邦式的想象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具有社会颠覆功能”^[4]。在《饿乡纪程》中,瞿秋白心目中的祖国形象是“阴沉沉,黑魑魑,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所在,我有生以来,没见半点阳光”,是“有着香甜的食物,轻软的被褥”的“黑甜乡”^[5]。在他从山东至北京至哈尔滨再至满洲里的旅途中,满目看到的都是饥饿、苦难。在他看来,十月革命正是透进黑暗中国的一线阳光。无论是从“自己心灵的要求”,还是为“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他将要“拨开重障,放这光进来”,那“一线的光明,血也似的红,就此一线便照遍了大千世界。遍地的红花染着战血,就放出晚霞朝雾似的红光,鲜艳艳地照着,也快要被他

笼罩遍了”。与此同时，有关苏联的另一种传言不时闯进他美好的幻想和坚定的信念之中，他知道“那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被众人看作是“罚疯子的地方”^{[5]3}，那里是“饿乡”，是饥寒交迫、战争内乱交错的所在，但他把自己比作斯多葛主义者。可以说他是混合着受难者的意志和朝圣者的心情决心亲自考察、研究这个国家的。从北京通向莫斯科的旅途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从1920年10月16日出发，直到1921年1月25日深夜抵达莫斯科，严寒的折磨、生活的不便、交通的阻遏、旅馆生活的无聊烦闷，以及沿途过往车站的景象，民主共产的旗帜、城市人民的生活、道听途说的传闻等等，使瞿秋白初步感受到远东共和国的气氛，也扰乱了同行者的意志。另一方面，他们在旅途中也不失时机地参加了远东共和国的一些大会，阅读了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的书籍《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史》等等，这又使他们坚定了决心。正如他在游记中所写：“批阅一过，才稍稍知道俄共产党的理论，一切停滞的计划都打消，安心向目的地进行吧。”^{[5]62}但是，旅途中耳闻目睹的贫苦凄惨景色，已经使他对理论和幻想产生了怀疑：在他看来，传达思想的理论，表示事实的名物，“都只能与人以笼统抽象的概念，不见现实生活是绝对不能明白了解的，而且常常淆乱人的思断”，概念会使思想本身“惰性化”，“只凭主观概念中的理解去思索论断现实生活”，“往往使现实生活堕于抽象的恶化”。他清楚地认识到：“欲了解一国的社会生活，绝不能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他决心在理论研究、探访事实之外，更应该“领略社会心理反映的空气，感受社会组织显现的现实生活。”^{[5]63}

瞿秋白于1921年1月25日深夜抵达莫斯科，于1922年12月24日离开莫斯科。在旅居苏联近两年时间中，他工作负担极为繁重，物质生活极度贫乏，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两度住进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疗养院。他会见过列宁、托洛茨基、卢纳察尔斯基等领导人，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送殡仪式，会见过克鲁泡特金夫人、马雅可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家人，参观过文学艺术博物馆，也常往大剧院看戏，还参加过盛况空前的重要大会和阅兵、庆典仪式，在这些大规模的革命赤潮中，他感受到的是人民欢欣鼓舞，“革命的热度已达到百分”的气象。

正如瞿秋白所说，“一切调查，考察，制度，政事”用“政治史、社会史的体裁”，而“心程中的变迁起伏”则“用日记、笔记的体裁”，他“愿意在此突出个

性”。因此，《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说是“他心理记录的底稿”，“心弦上的乐谱的记录”^{[5]85}。这些政论性的文章，介绍了苏俄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外交状况，表达了他对布尔什维克之革命精神、苏维埃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肯定和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仰。而集散文、诗歌、杂记、回忆为一体的《赤都心史》则记录了他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反映了他的另一种苏联体验，透露了他的怀疑、迷茫之情。《赤都心史》一扫《饿乡纪程》中清晰的叙述、流畅的文笔、明确的观点而表现出某种“失语”的症状，实际上读者很难从中勾勒出清晰的苏联形象和作者明确的态度。其中充斥着即兴的、碎片式的段落，隐晦的象征和比喻，无缘由的伤感和抒情，不完整的叙述与句法结构，作者立场的隐含，自相矛盾的表达，暧昧的词句，等等。正如张历君所说：“瞿秋白在他的苏联之旅中不断遭遇事物本身所提供的无言的见证。他不断变换自己理解和观看事物的视角，力求寻找一种语言解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景象，但却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还。”^[6]《赤都心史》中的瞿秋白是一个多愁善感、喜爱艺术、病魔缠身、关心人类心灵、思索社会问题的青年，一个局外的、陌生的旅游者。游记中记录的也是作者主要的“游览”“参观事件”，拜访人物的片段，街景的描绘，工厂工人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领导者的号召力和群众万岁的呼声、革命的狂热，自己心绪的表达等等，有关苏联社会现实的种种记叙穿插其中，而他对苏联社会的看法则隐含在字里行间。他用“黎明”比喻苏联的现实，那是“鱼肚惨色渐转赤黑愁黯的霞影”之时，“夜色的威权仍旧拥着漫天掩地的巨力，现时天机才转，微露晨意，未见晨光，所显现的只是黎明的先兆，还不是黎明呢”^{[5]87}。莫斯科是“危机窘迫、饥寒战疫”的赤都，人民生活凄清、食物菜膳不容易取得、商铺紧闭，惟有宗教生活仍然十分兴盛，五一节期间，教堂里人山人海，年老龙钟蓝缕疲弱的乞丐双手拱着等候基督教徒的慈悲。植根于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的官僚贪污作弊受贿，是俄皇时代遗传下的“成绩”中最显著的一点。一个小学的女教师为多求一点口粮兼任临时教席而受审判，可是，审判官们每人至少超额领取了七份口粮，一位营官作弊贪污五百万苏维埃卢布，营长和委员长因贿赂不均相互告发，营官被判处死刑。革命初期苏联的阴暗面和丑恶现象无时不折磨着瞿秋白，生活现实、个人体验时常与他在共产大会、仪式、大规模的群众组织中感受到的苏联人的精神、理论、信仰相冲突，这使他迷惘，不时发出无力胜任全面、正

确地认识一个国家的感叹。

瞿秋白的两部游记长期以来随着对于瞿秋白革命道路和理论信仰的研究不断被诠释。但他的两位同行者俞颂华和李仲武的两部游记《游俄实纪》、《游俄国见闻实录》在风格和内容上都十分相似,虽然在当时被广泛阅读,但在建国后却几乎不再被提及。俞颂华在赴苏途中因旅途的艰辛和看到的凄惨景象而心生退缩之意,在瞿秋白的鼓励下总算到了莫斯科,但只呆了三个月就回国,时间仓促短暂,他在游记前言中说自己本不想发表游俄感想,以免唐突了“这世界上簇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凡知道他游俄的人总是要询问他关于苏联的情况,他只好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写作发表,作为简括的答复^{[7]2}。游记就赤俄之外交(特别是闭关锁国的政策)、经济状况、中国人最关心的财产归属、分配问题、农民处境、社会状况诸如妓女问题等等,作了粗略的说明和自己的解释。反映了苏联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经济改造、教育改造,都因为缺乏改造所需的物质和人才的困难而步履艰难。他认为连每天要吃的面包也由政府分配,“分配政策是很有理想的”,倘使粮食、日用品都由国家分配,倘使果能完全办到,那必将会废除金钱及其相关的一切^{[7]14}。关于无产阶级大众,他认为:“所有无产阶级的人民,大都头脑简单,没有政治上充分的智识和经验,故共产党便自命为无产阶级的先锋,而实行其独揽大权的政策……这种制度只有在得精明强悍,极有智识胆量且能公而忘私的领袖人物时才可行得。”^{[7]53}对于苏联“举手表决”的所谓民主选举的方法、对于非劳动者、游惰者听其自然,“不帮他们解决面包”,任其自生自灭的做法,俞颂华的否定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与瞿秋白游记不同的是,俞颂华和李仲武的游记少主观感情的抒发而多“客观”“中立”的报道,他们将自己的感情隐藏了起来或者将其省略,采取一种局外人的立场和态度,小心谨慎地做到客观讲述。

三

大约在瞿秋白一行旅苏不久,无政府主义者抱朴于1921年春同其他十名青年,经过重重困难辗转来到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学习,直到1923年秋天离开莫斯科回国,同期的学员还有曹靖华、蒋光赤、韦素园等。抱朴于1920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专心学习俄文,对十月革命充满了幻想和狂热的崇拜。在《赤俄游记》(1925年7月)中,他说:“我当时是布尔雪维克主义狂热的信徒,诚信俄罗斯已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很想利用这些事实向国内宣

传。”^{[8]17}当他在伊尔库茨克问及旅馆工作人员苏联的情况时,招待员说人民委员会委员与工人、男人与女人生活一样,一切平等,他自己喜欢得手舞足蹈,立刻写信回国宣传。《赤俄游记》记录了他在苏联学习考察的经历和他对于苏联革命的认识。他所关心的问题也是那个时代许多苏联观察家关心的焦点问题,诸如没收私有财产、国家分配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农民问题、教育改革等等。但他的叙述和评价却截然不同。游记同样记录了旅途的艰难困苦和沿途的所见所闻:衣裳蓝缕的农民,各个火车站乞讨的人们,破败的房屋以及拥挤的火车和各个关口的无端盘查。他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12天之后,接到第三国际支部的通知,让他搭乘某个委员会委员的专车一起上莫斯科去。与一般平民乘坐的火车不同,“专车”非常宽敞,构造也非常精致,这些委员都是政府的上级官员,车上还有两个卫兵。在车上每人发给三万卢布,还有香烟和火柴。“共产党的训令上虽然有禁止党员经商的规定,但我同车的委员们并没遵守这种信条”,他们买了大量的食盐,沿途兜售,路上的检查虽严,他们的车却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委员们的几大捆行李安然通过重关^{[8]19}。最让他不能容忍的,也是给他印象最深的,不只是革命初期的经济困难、物质匮乏、民众生活的困苦,更重要的是委员们的特权、专制、官僚习气和干部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他把这看作俄国人民不幸的主要根源。他认为集产制是建立在“沙土上面”的,私人工厂收到国家手里,但又无能管理,徒任其废坏。工厂原料缺乏,不能开工,工人寥寥无几,工资与工作时间完全没有定章,国家的工业计划也就成了“纸上谈兵”。与工人谈话,觉得他们充满着反动思想,甚至厌恶共产主义。劳动者的状况因为物质的贫乏而显得尤为可怜,“农民的余粮,有时连他们最后的种子也拿走了。这种愚蠢的办法,自然使农民愤激,因此便出于怠耕的一途,致供给全欧面包的俄罗斯,顿陷于饥谨的状态。”“对于革命的理想,反很冷淡了。”国家将一切物资集中管理,但是管理机构的委员却自肥了,从前一贫如洗的工人,做了委员,就有了马车、汽车或很好的房产,骤然变成了富翁。莫斯科郊外的避暑地,“从前是贵族资本家的消遣地,现在却一变而为红色军官、苏维埃官吏、新中产阶级的娱乐之所了。”^{[8]57}排斥异己思想,不仅压迫资产阶级的文化,即使意见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没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具有不同思想的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被关进监狱,使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缺少有识的社会主义者。普及教育的计划尚未实施,由于物质匮乏,

教育实际上不平等,国家给学校的投资只能维持教员两三天的生活,学校向学生收费,党员有优先权,非党员的受不到国家的资助,经济困难便不能上学。大学因物质生活的压力而不能正常开展,学生实际上也不能很好地念书,每天把时间浪费在排队领食物上。大学管理混乱,课程设置没有定制,老师上课不按时,科学实验因缺乏实验的材料和仪器几乎不能开展。最后,作者说:“从前怀想俄罗斯如天堂一般,可是现在已是灰心绝意,脑海中充满了死的恐怖。”^{[8]36}1923年,当抱朴提出回国的要求时,有关委员会决议说他为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尚未将旧信仰完全消除,仍留校读书”^{[8]70}。经过再三请求,他被允许回国,但在回国途中,处处遭难,受到盘查,赤塔火车站接到通知对抱朴不予接待,他和其他的同行者陷于饥谨状态,几经周折才度过险关回国。由于十月革命初期的种种困难和存在的现实问题,使先前信仰社会主义、同情革命的青年产生了怀疑,甚至放弃了信仰,对革命产生了恐惧。

与瞿秋白、俞颂华、抱朴等这些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观察者不同,自由派诗人徐志摩的游记更具有文学色彩。1925年,徐志摩以个人身份、作为一个“平淡无奇的游客”去苏联旅游、考察,写了《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刊载于《晨报副刊》。徐志摩说自己有资产阶级的头脑,崇尚个人的自由,迷恋诗人、文学家以及言论自由、行动自由等等。他的游记也不同于其他人的游记,他的写作没有政治目的,他也不关心政治,只是“笔头上有什么就往纸上写,管得选择,管得体裁,管得体面!”在其游记中,徐志摩对流血革命表现出极度的厌恶,他对革命者的反感在游记中有明显的流露。他在火车上遇到两个苏联人,头上是黑松松的乱发,身上穿着青辽辽的布衣,衣襟上都针着红色的列宁像,枕头底下压着勃郎宁手枪,徐志摩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了难熬的一夜。到了莫斯科,徐志摩看到的是一幅寒冷、黑暗、恐怖、穷困的景象。莫斯科河上乌鸦在寻食,莫斯科上空是迷蒙的、半冻的、愁容的、服丧的;泥泞的街道,不再有漂亮的奢侈的店铺,最热闹的是政府经营的吃食店;街上的行人穿着单调邋遢的服装,蓬头垢面,神情忧郁、惨淡,“见面时不露笑容,谈话时少有精神,仿佛他们的心上都压着重量似的”,“活像监牢里的犯人或者是地狱里的饿鬼。”^{[9]84}贫穷破败的景象、街头狂热的革命表演使他心生厌恶。但他对于苏联政治制度和现行政策没有兴趣,他只是从人道的、审美的、艺术的眼光去审视、评价他所看到的景象。他的兴趣范围、也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是革命中,旧的俄罗斯和传统文化、特别是那些伟

大作家的命运。他看到和想象到的也更多的是革命对于旧俄罗斯文化的毁灭。在徐志摩看来:“革命的大火不仅烧烂了专制的、贵族的、奢侈淫靡的俄国,烧毁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社会,但同时,也荡尽了俄国的文化”^{[9]81}。他把革命后的苏联视为文化荒原,他认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妥斯拖耶夫斯基濒临灭迹,部分作家逃往国外,留在国内的则过着饥饿的生活。他对于现代苏联艺术的政治宣传表现出极度的憎恶,他在游记中详细叙述了他所观看过的一出具有鲜明政治宣传色彩和象征意味的戏剧。可以说,徐志摩是以诗意的、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苏联这个国家的。他把莫斯科这座“曾经多少变乱的大城”比作“一座着火的血红的大城”、“怖梦制造厂”,“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与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9]80}最后,游记以拜访契可夫墓园作结:“在墓墟间,在晚风中,在山一边,水一角,慕古人情,怀旧光华”^{[9]98}。徐志摩理想的国家显然是宁静、优雅的文学艺术之邦。

毋庸置疑,观察者的政治倾向、社会身份、价值观念、个人性格,在目的国旅居、参观的时间长短、考察访问的途径、消息来源的渠道、行踪线路图、考察对象、旅游的景点、语言、作为一个旅居者在异文化中的生活体验——衣食住行的满意度,还有各种不为人知的潜在因素等等,都影响着游记者对目的国的观感、态度和评价以及最终的书写。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旅苏游记中的苏联形象基本是单一、刻板化的。苏联现实的阴暗面成为游记者关心的中心问题:如分配制度不公、物质极端贫乏、没有平等自由、人民生活思想模式化、缺乏个性,文学艺术沦为政治宣传品,官僚特权横行,人民饥饿、愤懑,社会问题丛生等等,这些被看作引起国家混乱、暴力以及社会主义信仰危机的根源。这种反面形象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描绘的国家图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那些先前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倾向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言,这无疑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随着30年代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苏联经济的发展,乌托邦苏联形象在中国的确立及其在四五十年代的支配性影响,20年代及其后有关苏联阴暗面的游记便有意地被遗忘了。

参 考 文 献

- [1]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84.
- [2] 胡愈之. 莫斯科印象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16.
- [3] 陈之骅, 主编. 苏联兴亡史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98.
- [4] 孟华, 主编. 比较文学形象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41.
- [5] 瞿秋白. 瞿秋白散文名篇[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
- [6] 张历君. 镜影乌托邦的短暂航程: 论瞿秋白游记中的异托邦想像[J]. 当代作家评论, 2006(1): 111-116.
- [7] 俞颂华. 游俄实纪[C]//游记: 第二集. 北京: 晨报社出版部, 1924.
- [8] 抱朴. 赤俄游记[M]. 北京: 北新书局, 1927.
- [9] 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 第2卷[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mage of the Soviet Russia in the Chinese Travel Notes of the 1920s

CHEN Xiao-l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6, China)

Abstract: Cross-cultural travel and writing, as a mean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help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ve culture. The image of the Soviet Russia recorded in the travel notes by Chinese travelers in the 1920s, a major medium through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stand the Soviets, is diversified because of the Chinese travelers' different, sometimes even conflict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Soviets.

Keywords: cross-cultural travel; travel notes in Russia; image of the Soviet Russia

(责任编辑: 李向辉)